



1971年8月13日,中国驻加拿大首任大使黄华拜会加拿大总理皮埃蒙·特鲁多

中加建交引起震动

1969年底,我结束在驻美国代办处任期回国,稍作休整后便前往外交部设在湖北钟祥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半年多后,我突然接到回京通知,到欧美司上班分管加拿大业务。当时“文革”未结束,外交部机构精简,欧美司业务范围广泛。此前管加拿大的只有祝秋生同志一人,我来给他当助手。当时中加在斯德哥尔摩的建交谈判接近尾声,外交部正抓紧配备干部组建工作班子。

1970年10月10日,长达21个月的中加建交谈判胜利结束,10月13日两国同时发表建交公报。这一外交大事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作为加拿大邻国和盟友的美国,虽事先知晓建交谈判,但公报发布时仍受到震动,因加拿大未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加拿大是北美洲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也是继中法建交后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第一个有影响的西方国家。中加建交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为中美增添交往渠道,推动众多西方国家与我国建交,迎来第三次建交高潮。

中加建交让外交部美洲事务热络起来,管加拿大工作的人从坐“冷板凳”变为坐“热

中国“橙”对欧洲影响有多大

丝绸之路上的中欧间物种大交换,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原产于中国的“橙”为例,它曾被引种到欧洲,在欧洲各国形成了一股长期的“橙子热”。

酸橙在10世纪前后由阿拉伯商旅带到阿拉伯世界,进而在数百年间扩散到欧洲腹地。意大利人把酸橙树种在小桶、小盆内,成为可以随意移动的盆栽,还可以放置在围墙栅栏后做成墙树,形成私密空间,以至于酸橙树成为“文艺复兴式别墅”和“意大利式花园”中不可或缺的园艺景观。

1533年,法国王储亨利二世迎娶意大利贵族凯瑟琳·美

中加建交推动我国迎来建交新高潮

1月1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加拿大总理卡尼。

中加两国的外交历程历史悠久。本文作者吕聪敏先后在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外交部欧美司、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等任职。他撰文讲述了中加建交的内情。

板凳”。建交后,筹备建馆成为当务之急,包括派先遣组赴加、准备外交文书、设计大使拜会活动、接待加方建馆人员等。1971年2月,以徐中夫临时代办为首的先遣人员离京,之后为黄华大使赴任做准备。黄华大使因参与基辛格秘密访华接待工作,赴任时间推延,7月23日才赴加拿大。加拿大政府重视黄华大使的礼宾安排,7月27日递交国书后,使馆开始正式办公。北美洲与中国隔绝二十多年,人们渴望了解中国,使馆每天办签证和访谈的人络绎不绝。馆员超负荷工作,但使命感和荣誉感带来动力。

不久,加拿大驻华使馆也在北京开馆,首任大使柯林出生在传教士家庭,童年在中国度过,他对重返故地用“奇迹”和“梦”形容感受。

亲历建交初期的频繁互访

双方设馆后,各项工作全面铺开,人员往来开始活跃。加方在建交谈判中所关心的一些具体双边问题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拿大是“贸易立国”,关心尽快打开中国市场。1971年,应中方外贸部邀请,加工商贸部长佩潘访华,这是我参与接待的第一个加政府代表团。我方对这个代表团非常重视,周总理亲自会见,进行了长时间谈话,达

第奇。后者使意大利风尚得以在法国上行下效。“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凡尔赛宫里成百上千株酸橙树是他彰显国力和品位的重要凭据。

据记载,在12世纪的西西里,酸橙只是“愉悦眼睛之物”,而文艺复兴时期,橙逐渐演变成艺术景观。在波提切利的《春》、扬·凡·艾克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等诸多经典画作中,酸橙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意象,暗含着圣洁、高贵等多重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酸橙花的香、酸橙汁的调味价值及药用价值都慢慢被欧洲人接受和使用。

(摘自《文史博览》朱禹函、马秀鹏、刘强强/文)

成广泛共识。这次谈话向世界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建交后不久,我方还着手解决加方原在南京的大使馆的财产和民生公司贷款等问题。由于我方准备充分,加方也很合作,通过友好协商,问题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解决,加方悬在心头的好几件事满意了结。事隔多年,当时经办这些事件的加驻华使馆政务参赞、法学家考皮松在温哥华同我见面时回忆说,当时双方既沿用国际上通用的一些做法,又充分考虑到实际情况,体现出互让互谅精神。加方也没有预料到问题会解决得那么顺利,中方的诚意和合作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2年,加外长夏普访华,主持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加拿大贸易博览会。这次活

中国人说到龙,除了丰富多彩的龙民俗外,还会谈到一种特殊的服饰——龙袍。其实,龙袍指定作为皇帝的正装,历史并不太长,源于600年前的明朝。

此“龙袍”非彼龙袍

东华大学服装学院服装史专家包铭新教授告诉记者,明朝以前,中国的帝王也有穿“龙袍”的,但与后来的龙袍明显不同。其一,看先秦的龙纹,形象比较质朴粗犷,大部分没有肢爪,近似爬虫类动物。秦汉时期的龙纹,多呈兽形,肢爪齐全,但无鳞甲,常被绘成行走状,给人以虚无缥缈的感觉,根本不像人们今天所熟悉的龙袍。其二,也是最重要的,明朝前,龙纹服饰虽是一种权威象征,但未必就是皇帝一个人的“专利”,其他的贵族也能穿戴所谓的“龙袍”。

目前为止,尚无考古发现证明,明朝以前的皇帝有专属的龙袍。比如,元朝的每个皇帝都有生前画像,他们服装简

朴,都没有龙袍相伴。

黄色不是龙袍唯一色

进入明代,中国封建社会确立了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龙袍被指定作为皇帝正装,而且他人不得穿戴。明朝、清朝的龙袍绣有9条龙,其龙纹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图案。另外,明朝以后,皇帝亦赐龙袍予王公大臣,他们的服饰上绣着龙纹,但不能称为龙袍,只能称“蟒袍”。

兴也龙袍,衰也龙袍

服饰是等级制管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在一段时间内,对稳定大一统的多民族王朝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服饰制也正是中国封建王朝开始走向衰弱的标志之一。皇帝、官员依靠服饰来彰显权威,在治理国家方面却常常显得无能,时间一长,这样的统治必然瓦解。据史料记载,除明清帝王外,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复辟称帝的袁世凯均为自己量身定制豪华的龙袍,但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稳定的宝座。

(摘自《新民晚报》逸民/文)



皇帝独享龙袍源于明代

人类有什么能力远在AI之上

AI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经常在思考一类问题:人类和AI(人工智能)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人类有什么能力远在AI之上?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知道AI的本质是什么。请记住一句话:任何一件可以总结成算法去做的事,人类一定干不过计算机。

AI就是廉价劳动力。在你明白这点之后,你再去看看,AI可以写文章,可以搞编程,而人真正能做到且只能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判断,就是你敢不敢去判断对错,敢不敢为你的判断去负责,除此之外都不重要。比如你的职业、你定居的城市、你的另一半、你的人生目标、你的未来规划,所有这些都需要判断,都是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能明辨是非的才是真正的知识,否则你做得再精准,都只是在成功概率的小数点后面缝缝补补。

我们举个例子:AI可以写一个还不错的程序,可是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写这个程序,AI可以写一篇能获奖的文章,可是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写

宽容为尺,恩义为光

周敬王十五年(前505年)九月,18岁的楚昭王熊轸骑着瘦马踏入郢都城门。断墙上的焦痕还带着吴兵焚烧的气息。沿途百姓或鞠躬或抹泪,他勒住马缰,心中了然:楚国人要的不是复仇的君王,而是能让家国重生的脊梁。

回宫次日,楚昭王下了一道震动朝野的令:逃亡功臣不论贵贱皆有奖,背叛者愿归则既往不咎。这道令,成了楚国从废墟中站起的第一块基石。

曾拒绝载他过河的蓝县尹(蓝县,今湖北荆门东)蓝尹璠,穿着破衣跪在官前请死。楚昭王扶起他:“你让我记着‘失民心者无船可乘’,今日便做我的‘镜子’。”当年想为父报仇、躲在门后欲刺他的斗怀,也来请罪。昭王不究旧怨,反封他官职去收复失地:“此时杀你,谁还救助楚国?”而借秦兵救楚的大功臣申包胥,却背着布包要回乡种地:“我为楚国,不为爵位。”楚昭王含泪目送,知其心在苍生。最暖的是侍卫钟建——当年背着季公主为妻,被封乐尹,让楚国旧乐重响街巷。

这篇文章。我们经常说,把试卷答到满分,只能算二流的学生;敢质疑老师、提出问题的才算一流的人才。这种质疑就是全局视角,就是跳出规则,重新去审视规则本身。

这三项能力人类碾压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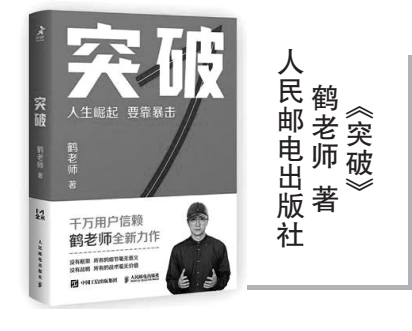
有哪些能力可以让你跳出规则?我们总结了三项,正是人类碾压AI的地方。

第一项,是降噪能力。AI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它不可以降噪,它没有办法识别原始数据的真假。你问它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它是回答不了的,因为它接触到的信息可能是错误的,是有偏差的,是被污染的。不解决信息的纯度问题,信息的数量多一万倍也没有用。输入都是错的,怎么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输入这件事情,归根结底还是由人来解决的。AI再厉害,能做的也只是在虚拟世界里面不停地吸收信息。它不能够突破虚拟世界,不能进入现实中,它只能吸收数字信号。可能有一万个专家告诉它,如果你这么做,就可以得到这么一个结果;可是如果它

不在真实的世界中做实验,它就永远无法从底层去判断这个东西到底是对还是错,是真还是假。当它没有办法去接触真实的世界时,它的信息源就不可能被降噪,这就是我们说的,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才是具有判断力的基础。

第二项,是战略能力。AI拥有的是什么?是技术能力,你告诉它任何一件事情,它都可以做好。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战略能力,它不需要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做好事情的人,而缺乏那些有战略能力的战略家。比如刘强东,最开始大家都反对自建物流,但是刘强东说我们必须建,这就是未来的竞争力。比如黄仁勋说永远不要去管你的竞争对手,你要做的永远是不停地迭代,让明年比今年强一倍,永远这么去做,不要去管用户需不需要,不要管用户怎么说,因为用户看不了那么长,因为用户对你到底要什么一无所知。

AI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办法去给你制定战略,因为它没



有权力按下那个按钮。它给你按错了怎么办?把自己格式化赔偿你吗?

第三项,是元思考的能力。我们经常讲,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第0步。不要上来就开始做,而要退后一步想想为什么这么去做?

当年马斯克在做真空胶囊高铁的时候也用到了第0步。如果用传统的思维去设计火车,很多人就会在现有的功能上去改进,比如让动力更强,让流体力学的计算更精准。可是如果你回归本质,无非就是从A到B,那么既然是从A到B,为什么一定要通过牵引力才能实现呢?于是就产生了真空胶囊,高铁采用磁悬浮加低真空的模式来实现动力。AI可以告诉你执行环节的第1步、第2步、第3步、第4步,唯独没有办法告诉你第0步。

不以下棋为生

子,都是来自业余内的事。千万不要当什么专业作家或职业写手,他们要么服务体制,要么服务市场,离文坛很近,离文学很远。

阿城先生的小说《棋王》中的主人公王一生遇到了一个以撕大字报、卖废纸为生的老头,那老头是个象棋高手,是身怀绝技的一代宗师。王一生对他极其崇拜,但又十分困惑:棋技如此高的人,为什么还要靠拾废纸为生呢?于是就想向老人说出了自己心中的困惑:“我说您老人家棋道这么好,怎么干这种营生呢?”老头儿叹了一口气,说这棋是祖上传下来的,但有训——“为棋不为生”,为棋是养性,为生会坏性,所以为生不可太盛。王开岭的坚守,其实就是一种“不以下棋谋生”的境界,写作于他而言,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信仰。在当下这样一个喧嚣浮躁的功利化时代,能坚守“不以下棋谋生”的信念,的确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选自《特别文摘》唐宝民/文)

据说,有一回,一个学生问数学家欧几里得:“研究几何能带来什么好处?”欧几里得听罢勃然大怒,吩咐仆人说:“给他3个钱币,让他走,他居然想从几何学中捞取实惠!”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想要在某一方面做出成就,就必须戒除功利心,功利心太强的人,是无法在某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

当代著名作家王开岭从2000年出版《激动的舌头》起,已出版了多部著作,在文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按理说,王开岭完全可以 把时间交给写作,做一个靠稿费和版税生活的专业作家,可是,王开岭却没有这样做,他一直没有放弃工作,而只把写作当成一种业余生活。为什么呢?原因是为了保有创作的纯度,不想为面包写作,担心那样一来,会降低自己作品的质量,成为文坛垃圾的制造者。他说:“媒体是我的职业,写作是我的生活。人和人的差异即在于业余,我曾说,真正的好东西你一定要留给业余,就像老婆孩